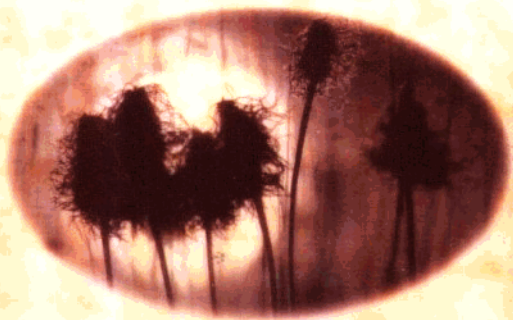


红
嬰
集
丛
书

铁 凝



珍藏版

影 记

铁凝影记

河北教育出版社



铁 凝

一九九五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中国召开之际，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一套由男作家王蒙主编的女作家作品系列丛书，

“女作家影记”序

名曰“红罍粟丛书”。该丛书一经面世便受到海内外众多读者的欢迎，并且在两年之内连续获得中国出版界两个奖项：第二届全国优秀妇女读物一等奖和第十届中国图书奖。

“红罍粟丛书”的重点策划人、河北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亚民，也似乎由此而引出诸多出书的新奇的点子，独到的灵感。比如这套“女作家影记”的出版，便是得助于“红罍粟”之后他又一个新奇独到的思路。

这套由九位女作家每人一册组成的“影记丛书”，是“红罍粟丛书”的第二系列。每册影记包括作家精心挑选出的一百余幅照片，以及由照片引发出的文字。这些文字，或诠释照片，或叙述往事，或抒发感慨，或思念亲友、师长……是照片引发了文字，而文字又丰富了帧帧照片这方寸之间的内涵。是照片引我们注视起写作之外我们自己的生活，亦使我们每个人对这本影记的写作比其他时刻的写作投入了更多的兴趣和情感。应该说，“影记”的形式并非前所未有的，特别在国际国内的演艺界，影视明星们推出华美、精致的“写真集”的早已不乏其人。但作家的影记与影视明星的写真集可能稍有不同：它既不是明星形象风采的汇集，展示，也不是摄影技巧和摄影艺术的竞赛表演。它侧重的是与作家的生活、阅历、写作、亲情、友谊相关的那些直观而真切的图版；它不回避的甚至还有作家在某一瞬间稍显狼狈的，或者说简直不便于示人的形象。这样的照片，因为平凡而质朴，也许更能引人怦然心动，读者会从中看到作为一个“人”的她，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她。“女作家影记”的创意和写作宗旨便是在这样的前题下完成的。有人说照片能够揭示灵魂，有人说照片能够募

改灵魂。姑且不论照片对灵魂的揭示或者篡改，我只想说是有一点是定而无疑的：那便是当我们得知被拍照时，在瞬间与相机镜头的配合——以我们或幼稚、或刻意的方式。只因要配合的心情是真的，所以那被照片凝固了的瞬间，毕竟拥有着独属于它的某一种真实。

我常常觉得，一套丛书从策划到出版，与一个作家的一部书稿单独面对出版社是不同的，它需要几个重要环节的妥善衔接。首先是创意者意向的新鲜；其次它要靠出版社慷慨而热情的肯定，以及编辑们付出的诸多细致而琐碎的辛苦；然后它要求主编为此尽力；最重要的是它还必须有丛书的主角——作家们的积极响应。

面对出版在即的“女作家影记”，窃以为上述几个重要环节均已有了妥善的衔接。因此，第一我要感谢王亚民最初的美好创意；第二我要感谢河北教育出版社全体同仁从始至终的支持；第三我要感谢我的八位同行，她们对该丛书的积极响应和诚恳写作使这套书具有一种别样的意趣盎然的人情味儿。比方最年长的宗璞老师，她的“影记”是抱病完成的；比方远在福建的舒婷，由于担心邮寄遗失，去德国之前她亲自携书稿飞至北京，当面交与出版社编辑。其余诸位，我亦深知她们对这次创作的珍视。最后我也想感谢我自己：作为此次被出版社邀请的主编，我为我对这套书所尽的微小心意和努力感到愉快。

美国哲学家詹姆斯有句话叫做“伸向过去的欲望是人的基本经验”。“影记”的编撰唤起了我们“伸向过去的欲望”，我们或简单、或深奥的历史，就在这样的欲望里和这样的写作里沉浮了一回。当“影记”完成之时，书中的我们也已经是过去的我们。眼睁睁地看见了已经过去的过去，或许会使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生活生出更多一些的珍重之情。而那所有过去了的，都将变成亲切的怀恋。

铁 凝

一九九七年六月八日

这本《影记》，从选择照片到完成文字，是一次我看我自己的过程，是一次我对我的流览。

选择照片时，想到此“影记”既不是摄影作品鉴赏，也不是肖像艺术集锦，我便侧重了照片本

自序

身的真切平白，而非摄影艺术和摄影技巧的高超奇妙。我私下里觉得，面对属于作家的这样一本影记，相对于被昂贵的镜头和讲究的布光，被现代化的手段以及摄影师的匠心塑造成的或说美化了的脸，读者大约更乐意看到能呈现某种历史的呼吸的图片。这样的图片，它们往往缺少构图的规矩，它们反映出的对象本身有时也会显得单薄、呆板。但它们似乎比艺术化了的影像更接近我生活过的生活。

面对这些图片，我试图更接近我自己。虽然我深知，一个人能够真正接近自己是不容易的。

面对这些图片，我的确感到有话要说。那么，让我们开始吧。

铁凝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



我出生后的第一张照片：一百天纪念照。在中国，孩子的一百天很被大人重视。北方乡村，孩子一百天时，亲友是要表示正式庆祝的。大人努力把馒头蒸得很白，点上红点，酒也有。白馒头、白酒诱惑着客人的肠胃，而作为庆典主角的那个小人儿，却往往被人遗忘在一边。

城市的父母则更看重孩子形象的郑重面世。满月虽然也是人生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满月的孩子眉眼大多还未长开，皱皱巴巴的，大人也就不太重视留下他们的形象了。这张一百天的我，看上去眉眼已经舒展，且是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母亲告诉我，我头上的毛线帽是淡粉色兔毛的，我被换上新衣服，还体面地兜上一块干净襁子。但是一百天的我和一百天的别人一样，是坐不起来的。为了让我表演这个坐相儿，母亲就非得蹲在椅子背后，用两手卡住我的腰。我好像还努力配合了母亲这个意图，竟然坐得比大人们预料的要好。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岁末，在北京。（图一）

一九五八年秋天，一岁的我，梳着与男孩子并无差异的分头。这人睁着大眼半张着嘴，看上去是要竭力记住眼前的一切。长大之后想想，那时的一切却什么也没记住。若没有这张照片，就连她当时的发式也得靠大人讲给她。（图二）

大约三岁，有了点女孩子的特征。我住在北京一位保姆家。那时工薪阶层的父母花很少一点钱，就可以放心地把孩子放在别人家中。（图三）





我在北京保姆家一住三年，我管她叫奶奶。她是一位粮栈老板的遗孀，却粗手大脚，喜爱劳作，当时她大约五十岁。住在奶奶屋的还有那老板的二房，我管她叫里屋奶奶。我和两位寡妇住在一起，对我负有责任的是外屋奶奶。这奶奶十分疼爱我，遇我高兴或不高兴时，便从一个齐腰高的大缸里拿点心给我吃。我以为那青石缸盖下一定有满满一缸点心，一缸点心总能使一个人的情绪稳定吧，我常因此而忘掉不在身边的父母。

但人生好时光总是有限的。现在我和奶奶一起照相，我们要分别了，我要回到在外地工作的父母身边。照相前我们都哭过：我脸上有一种没着没落的哀伤；奶奶虽然强作高兴，但下眼泡还肿着。我仍然穿着那件三岁照相穿过的小方格外衣，看来这是我的一件“礼服”。三岁穿时本是罩了棉袄的，这时只能单穿了，而且扣子颜色也不统一，显然是奶奶没有找到我丢落的扣子，才配了这一枚。

我确信五岁时与奶奶的分别是我记事以来初次最真切的悲伤。

大概我在奶奶家时人缘也不错，还招来过同院两姐妹的疼爱。姐姐叫大荣，妹妹叫二华，她们抢着抱我，抢着给我讲故事。大荣的故事里总是有个“十字路口”，“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她讲道。我一直以为是“狮子路口”，这是什么意思？有狮子的地方吧。

“文化大革命”乱得使我也失去了和奶奶的联系，只知道她已搬家，随一个侄子过日子去了。还听我的外婆说，奶奶还在街上卖过冰棍。一次两人相遇，奶奶一定请她吃一根五分钱的奶油冰棍，她本还有三分钱一根小豆的。外婆推辞一阵还是吃了。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奶奶，也没有吃过她的冰棍。（图四）

我的曾祖父。

在以太行山东麓为源头的河流中，有条最短的河叫汶河。大多数人把汶河念成“交”，实际音“孝”。它从河北省的井陘、获鹿发源，只经赵县一县入宁晋泊。这条河短小，河上有座桥却名声显赫，便是隋朝李春所建的赵州桥。河的渺小，桥的伟岸，河之于桥常给人一种担待不起的感觉。

赵州桥东六里有个叫停住头的村子，即是我家祖上的居住地。传说西汉末年王莽追赶刘秀时，刘秀曾在这里停留躲过王莽的追赶，停住头因此得名。此传说或许并非完全虚构，《资治通鉴》记载着这段王刘之战的历史：“秀因留真定……进出元氏，防子，皆下之。”元氏、防子属真定，即今赵县一带。

我去过这个冀中平原的中等村子，和那些典型的冀中农村没什么两样。近看大多是黄土地平地上突起着的黄土墙垣，远看像航行在海洋中的一艘灰蒙蒙的舰船。据我父亲讲，我看到的这个村子，和他儿时看到的没有多大改变。

近代史料载，清光绪十四年（公历一八九五年），军机大臣袁世凯在小站操练新军，从元氏、赵县一带招募新丁数百人，赴冀东滦州一带操练。新丁中有位中等身材，面目淳厚的青年便是我的曾祖父屈春霆。后来这青年在军中越过兵卒直接被委任以棚头（班长），又在保定讲武学堂经过陆军速成教育之后，便开始了他的行伍生涯，直至成为孙传芳的重要幕僚。军阀混战局面在中国结束之前，他最后的两个职位是孙系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少将衔），吴淞口炮台司令（中将衔）。他那传奇般的经历，据说半是靠了他程度不高的私塾底子，半是靠了他的相貌。不似他的另外两位同乡，在招兵站就被挑打了眼。一位同乡被招兵官评价为“两腮没肉，吃好的没够”；另一位被认作“尖尖的嘴，说瞎话鬼”。而我的曾

祖则被称为有着“两耳垂肩”的福相。我和曾祖父年代相距甚远，但凭着国人对相貌的注重，我也觉得这是一位很容易引起人们敬重的老人。“两耳垂肩”在照片上反映得倒不甚明确，但饱满的前额、明确、厚实的双唇、微微舒展开来的嘴角，和那无任何高傲、无任何委琐、亦无任何表演的目光，都表现着这老人头脑的睿智和能容纳百事的心胸，照片上的曾祖已是暮年，一个戎马终生后的暮年。行伍生涯的沉浮显然没有改变他作为一个停住头普通人的气质，尽管连家乡人也都始终称他“屈大人”。

乡人关于曾祖的传说很多，多是关于他为人的正直清廉。除却那些过分的溢美之辞，确有许多事实证明着那些传说并非荒谬。因为这位官职显赫的屈大人并没有为他自己挣得“万贯家产”，停住头他那两三座毗连的院落和当地的院落相比，除多用了些砖木外，实在没什么两样。在他“发迹”地的保定，一座普通的四合院“官邸”，在日本占领时被日军因扩建马路而劈去一半。而当他的父母去世，一班好事的村人撺掇着想把丧事弄成“超规格”的热闹时，这位少将旅长不得不率家人跪在乡亲面前，哀求乡亲将丧事从简，才未使屈家彻底破落。

我祖上姓屈。河北一带，屈是一个很稀少的姓氏。据《明史·成祖纪》载，屈姓乃明永乐年出湖、广移民至此。我现在的“铁”姓是没道理的，那是因我父亲年轻时心血来潮，把他名字的头一个字当作姓。

关于我曾祖为人的传说还有许多，比如他的不任人为亲。孙传芳统辖东南五省时，曾祖还任过浙江警务处长。这时期村人常借此去找他通融作事，但几乎无一人被留在杭州。他资助他们返回故乡，去做自己该做的事。那位“说瞎话鬼”也千里迢迢地去谒见屈大人，说，即使作屈大人的马弁也心甘情愿。曾祖也资助他路费，请他返回故里。“瞎话鬼”也姓屈。据云，“瞎话”回到故里却说屈大人曾委他以团副，是他坚辞还乡的，“太操心了。”

“瞎话”说。原来这“瞎话鬼”在乡里早有“瞎话”的尊号，不知怎么被那招兵官说中。

曾祖有过两位太太，共生四子一女。我的祖父是原配所生。成此书时，我曾努力寻找两位太太的照片，但终无所获。只知道她们一位是原籍的结发夫妻，另一位籍贯保定。

习惯行伍生活的曾祖，似乎更喜欢一人在他乡独处，只在很少时候他才接她们去防地小住。因此异地生活只给我的曾祖母留下了些片断的新鲜。她只记得有一次，正在保定为副营长的曾祖开拔汉口前，是孙传芳夫人资助了她回停住头的路费。孙当时为营长，在保定金庄和曾祖住同院。然后曾祖母到汉口去看曾祖，记得汉口有人样高的鱼，被人挑着过市。还有在宜昌，曾祖是如何识破了一个行贿者放在茶叶筒中的银元，令护兵退回本人的。

曾祖父是在军阀割据局面结束后还乡为民的，同行北上者便是孙传芳。孙回天津作了离公，曾祖则返回停住头故里，决心荷锄务农。一日，大约他正荷锄于田间，忽接天津孙宅打来孙传芳遇刺的急电，放下锄头便去天津奔丧了。是他把施从斌之女施剑翘替父报仇枪击孙传芳于教堂的消息，亲口讲给停住头人的。

曾祖的荷锄务农不似袁世凯的“渭河垂钓”，他没有东山再起。原因并非没有机遇，是老人对时务的判断。阎（锡山）、蒋（介石）都曾请他出山，均被他拒之。因为老人已经隐隐发现他的长子——我的祖父正在家乡从事着一种并不令他费解的活动，便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形容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徘徊。”长子此时是赵县徘徊着的“幽灵”之一，他是国共两党在当地的建党人之一。老人对儿子行为的默认便是证明。“七·七事变”的炮声在芦沟桥响起后，老人作了避居西安的选择。保定陷落，次子、三子、四子从保定来赵县，也随同前往。不久，两个儿子和长孙（我的大伯父）从西安赴延安。我不愿用“送子参军”来形容老人的“革命觉悟”，我只想说这再次证明了我的曾祖



14
193



图 六

在错综复杂的时局中是个明白人。不似他的另一位同僚赵县人薛某，作起日伪邯郸道尹。曾祖在保定为孙部的左队官时，薛某是右队官。

曾祖父卒于新中国诞生的第三年，脑溢血吧。这张照片大约是他逝世的前一年在西安所摄。屈氏家族本应留下他更多的照片供我选择，据父亲回忆，仅停住头老家他的照片摆起来是要高过书桌的。然而因为历史的颠簸，老人好像成了一位不便与新中国谋面的人，这或许是家人的“多心”。许多年来烧毁屈春霆的照片成了他后代明哲保身的一个环节。他那散落在中国各地的后代你也烧我也烧，结果我大海捞针似地只获得这张。也许这是曾祖留在世上唯一的一张了，这是他的一位有心计的孙子——在西安医学院教书的屈长江从其父亲遗物中“抢救”出来的一块玻璃底板，据此印制而成。我庆幸这底板是块玻璃，才未能被他后代发起的烧相片活动所吞噬。（图五）

这张照片是我的祖父、祖母、我父亲和我的两位姑姑，屈家这一枝的大部。五口人站在县城照相师所设的布景前，祖父的长子和次子缺席，父亲是三子。父亲回忆，那天祖父从县城请来了摄影师，摄影师自行车的后货架上驮着一捆旧布，打开来便是这张公园似的布幔。我祖父又独出心裁地在布幔前增摆了一棵真的夹竹桃，形成了这个真假结合的环境。布幔就挂在我家的庭院里。

照相在当时的乡村自然是件大事。看起来他们都刚换过衣服，虽然那衣服充其量不过是土布或洋布。只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便是我父亲那双高筒的穿得不舒坦的袜子。那是一双瑞典毛织物，细看去上面还有典型的北欧风格图案。从瑞典袜子说开去另一个细节便是他们手中的精装大书。那是圣经——《新旧约全书》，新的，旧的，羊皮面烫金字。《圣经》的入镜并非为了证实

这家人已是虔诚的基督徒，那是祖父摆设下的一个小热闹。他主张照相时人得“自然”，他更坚信只有手拿东西才会自然。但从照片上看，这个细节并没有弄出什么自然来，而最不自然的便是祖父本人了。照相时的紧张，对各位家人的关照与嘱咐，还使他忽略了穿上长衫，他那身“短打扮”外面显然是缺了件长衫的，平时倒很少见他以这“短打扮”形象于人前。尽管他的布鞋最新，也没能弥补他穿着的缺欠。

当时有位瑞典牧师名叫单牧人的久居赵州，后来成了祖父的朋友。《圣经》和我父亲的毛袜都是单牧人相赠。单牧人有个儿子叫阿兰，也是父亲的小朋友。单牧人还赠祖父荷兰种奶羊，祖父勇敢地带头品尝羊奶，并使全家初次吃到单牧人栽种的蕃茄滋味。照片上的祖父最虔诚地持《圣经》于胸前，且能解释基督教的教义，却不是真正的教徒。他的人生兴趣更广泛，没有作教徒的清静心境。事后据我父亲分析，祖父让全家手持《圣经》，或许还有遮人耳目之用意，因为这张照片是要穿过日军占领区，送给远在山西太岳根据地的八路军大伯父的。照片上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是大伯父收到后所记，照片显然是摄于该年夏季。

祖父不具备曾祖“天庭饱满，地颌方圆”的福相，幼时且因伤寒使左眼失明，右眼也仅存微弱的视力。但他凭着一点私塾底子，顽强地自修读书。他爱书如命，藏书也甚丰，从线装诸子经典到精装《胡适文存》《资本论》，乃至库普林的《亚玛》……父亲常提及他读书的顽强：晚上，夜深人静时，在昏暗的灯光下，常听见一种微弱的沙沙声，便是祖父的鼻尖和书面的摩擦声。可见他视力之低下，读书之艰辛。他通读着历史和文学，又精研着医学。拍此照片时，他已是当地名医。他读线装《伤寒论》，还通过单牧人从日本定购洋装《皇汉医学》，西医的解剖、诊断学等书籍。他精通中西医，尤其是妇科和精神病学专家。更